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书系
BOOKS OF STUDIES IN CHINA NEW SUPPLY-SIDE ECONOMICS

优势突围

——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

(上册)

徐诺金◎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书系
BOOKS OF STUDIES IN CHINA NEW SUPPLY-SIDE ECONOMICS

优势突围

——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

(上册)

徐诺金◎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翠华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程 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势突围 (上、中、下册) (Youshi Tuwei) / 徐诺金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049 - 7747 - 2

I. ①优…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②金融事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②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644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36.5

字数 2566 千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268.00 元 (上、中、下册)

ISBN 978 - 7 - 5049 - 7747 - 2/F. 7307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其影响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世界就是由他们的思想统治着。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仆。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际上其狂想之源仍是来自若干年前某位学者粗制滥造的陈旧思想。我相信，就长期而言，与思想的影响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尽管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思想影响的人并不多，因此公务人员、政客甚至宣传家所运用的理论大多不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序 言

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回逆可追索到十六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资本、土地，而他的资本理论中包括储蓄理论和利润率理论。斯密认为储蓄决定于“节俭的美德和对利润的追求”，对工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生存，不可能有储蓄，储蓄只能来源于富人的节俭精神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当富人有了储蓄后，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便推动着经济的增长。斯密所谓的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指投资于土地、厂房、机器、工具等方面的资本，而流动资本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资本。他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利润，便把资本投到劳动人民身上”。^① 在这里，斯密又把资本的积累与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利润有下降的趋势。只要利润率不为零，则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仍会继续下去，但一旦资本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② 利润率就会降到零，资本积累与投资就会停止，经济就会陷于停滞。为了使利润率不致下降为零。斯密把人们的劳动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创造国民财富，非生产劳动不创造国民财富。

大卫·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理论，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收入分配与储蓄的关系。李嘉图认为，储蓄取决于收入分配，收入可分为工资、利润、地租，它们在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他认为：工资是工人及其家属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的部分；地租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和利润的部分。三者之间形成此消增长的关系。资本的积累能力取决于利润（李嘉图把利润称做纯收入）和地租的大小，当工资部分增大时，纯收入部分相应减少，可用于储蓄的资财也得减少，相反，则可用于

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的研究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3页。

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的研究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7页。



储蓄的资财便将增大。但是，他认为利润和地租只是储蓄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充足条件还应包括积累资本的动机——利润率。当利润率提高时，人们会把收入从消费转向投资，而当利润率下降时，则人们总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当利润率低落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动机就会全然停止”。^①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理论，有相同的地方，即他们都强调储蓄来源于人们的货币收入，收入取决于生产产品创造的价值，同时强调利润率在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其不同的地方是斯密强调“节俭”即要节省消费，增加储蓄，而大卫·李嘉图则认为，利润和地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用于地主和资本家的生活消费等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地主和资本家不能有节俭的美德，要增加储蓄，只有提高利润率，而且他也认为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并展望了当利润率低落时必然带来的风险。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纳入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理论，其研究范围和专业程度，以及理论体系的表述，不如继后的“新古典学派”完整，但必须承认它的历史作用。

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对储蓄的研究能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考察货币的储蓄手段职能，二是考察资本的积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储蓄与积蓄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只有货币积累“才有真正的财富积累”，而其他一切商品的所谓“积累”只不过是“特殊财富的储蓄”。马克思把“储蓄”与“积累”联系起来，而且区分了两种积累，即价值积累和使用价值的积累。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价值“积累”是指有着特定目的（如“致富的欲望”）的动态的经济活动过程即扩大再生产，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则是把特殊的使用价值堆积到一起，对此马克思主张用“储备”这一概念表达。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在研究这一理论中，均未涉及“储蓄与投资的均衡”，所以，在“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还值得提出的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魏克塞尔。魏克塞尔认为在他以前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理论”，在他看来以前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大都把储蓄当做是“价值的储藏手段”，而没有把储蓄看成是资本的积累。在魏克塞尔看来，把储蓄理论归结为货币发挥价值储藏手段的机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认为：“现代所谓的储蓄，是由储蓄人将其积蓄的储蓄金信托于银行，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8页。

然后由银行尽速地将其贷放于企业，而由企业将其运用于一种或另一种生产用途。”^① 储蓄的结果使生产更加资本主义化，即更加朝向未来，这对储蓄人来说不仅能索还本金而且可得到一笔附加的利息，进一步说，是储蓄人帮助其后代增加了真正的收入和消费。所以魏克塞尔的现代储蓄理论是“储蓄——资本积累”理论。

魏克塞尔自认为他的“储蓄——资本积累”理论是现代储蓄理论，而在他以前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是很贫乏的。这样的论断在笔者看来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应当承认，在这个主题上，他的研究有承上启下的功能。

继后人们研究储蓄主要是揭示储蓄与投资的均衡。第一个把储蓄与投资均衡联系起来研究的人恐怕也是魏克塞尔。他把奥国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与洛桑学派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储蓄与投资，认为影响储蓄与投资均衡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利息率”。魏克塞尔表述的要点是：（1）储蓄形成借贷资本的供给，投资形成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储蓄与投资的均衡也就是借贷资本供给与对借贷资本需求的均衡。（2）影响储蓄与投资均衡的是自然利息率。所谓自然利息率是与“资本预期收益基本一致的利率”，这个利率是可变的，它取决于对资本收益率的预期。（3）当人们预期资本收益率有希望上涨时，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加，产生需求大于供给，从而使利率上升，而利率上升又进一步刺激储蓄增长。（4）储蓄增长增加供给，但利率上升同时又减少企业家的需求，这一增一减又作用于利率，使供求“在比以前稍高的利率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5）在储蓄与投资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下，劳动的价格和物品的价值将保持不变。他提出这一套“储蓄与投资均衡”传导机制，是以假定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为前提的，即这两者一致时，就可通过货币均衡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在他看来，这两者由于种种原因经常背离，因而难以均衡。但是不可否认魏克塞尔把储蓄与投资联系起来研究，最早地考察两者怎样实现均衡。

除魏克塞尔外，研究储蓄与投资均衡问题有影响的要算凯恩斯，他把储蓄与收入、储蓄与投资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我们所谓的储蓄指的是个人货币收入和他对本期消费所作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总差额”。^②从凯恩斯前后的表述看，这里的“个人”是指社会成员。只不过在这里“社会成员”仅指企业家和雇员，而把政府置之度外。凯恩斯的投资是指社会资本在一个时期内的净增量。设这一净增量为 I ，“意外所得”为 Q ，储蓄为 S ，则 $I = Q + S$ ，即资本净增量等于意外所得加储蓄之和。由于“意外所得”不作为收入，也就不会形

① K·维克塞尔著：《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页。



成储蓄，因而储蓄便等于资本净增量减意外所得之差，即 $S = I - Q$ ，这样储蓄与投资必不相等。此外他还认为，储蓄是一群人的行为，而投资是另一群人的行为，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促使一群人的储蓄必须等于另一群人的投资。但后来他在《通论》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

“所得 = 产品价值 = 消费 + 投资

储蓄 = 所得 - 消费

故储蓄 = 投资”^①

凯恩斯先认为储蓄不等于投资，后又认为储蓄等于投资，这不只是计算方法问题，而是怎样建立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机制问题。在《货币论》中，他完全沿袭了魏克塞尔的见解，认为制约储蓄与投资均衡的重要因素是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但他又认为储蓄是各个消费者的活动，投资是企业家的活动，这两者不仅在量上不一致，而且作用的机制、产生的效应也不同。在《通论》中，他虽然指出了储蓄与投资自然相等，但是他又指出这种相等是需要有“充分条件”的，其“充分条件”通俗地说就是保持价格稳定。如果价格经常波动，则难以实现两者均衡。其实，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的是储蓄倾向递增，投资需求不足，主张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投资需求。所以，凯恩斯研究储蓄揭示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其着力点仍然是怎样建立起储蓄与投资的均衡机制。

除凯恩斯外，从宏观经济现象去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在当代恐怕要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了。萨缪尔森在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与凯恩斯的不同点是：（1）将固定资产折旧纳入企业储蓄之中，折旧也代表一定的供给和需求。（2）提出了“政府储蓄”的概念。（3）将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量化并进行实证分析。（4）提出了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式。萨缪尔森认为：个人储蓄（NPS）= 个人可支配收入（DI）- 消费（C）；企业储蓄（GCS）= 企业可支配的收入 - 消费（C）+ 折旧；政府储蓄（NGS）= 税收（TX）- 转移支付（TR）- 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付（G）。由于 $GNP = C + (NPS + GCS + NGS) + G$ ，并 $= C + I + G$ ，所以 $I = NPS + GCS + NGS$ 。

虽然在理论上萨缪尔森肯定了储蓄与投资的均衡性，但在实践上他认为这两者是难以自动均衡的。因为在他看来，产生储蓄与投资的行为主体不同、动机不同以及传导机制不同，他仍然主张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实现两者的均衡。

当代人们研究储蓄主要是揭示资金的融通。

基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重新认识“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这一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徐诺金研究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页。

员近期出版的研究成果。他在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所具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等独特的现象，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中国优势，这种优势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独特的人口红利。他提出了中国优势论和金融生态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中国正是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假设和思想突破，是对中国之谜的一种全新解释，中国需要珍惜和利用这一优势，再创新的奇迹。徐诺金研究员的这一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很有见地，值得重视。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理论，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大挑战。本书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理论和主张。当然，这些理论和主张还需要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本文算是一个进行这种讨论的先声吧！

是为序！

曾 康 霖

2015 年 5 月 27 日

前 言

——对当前我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这些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在要投资还是要消费，要速度还是要结构，要增长还是要环境中徘徊，并在总体上采取了一种抑制投资、刺激消费、放缓速度、调整结构的政策取向，结果经济一路下行，从2010年以来，已连下四个台阶，至今仍存下行压力，面临突破新的保底红线的可能。究其根源，我认为错不在政策，而在我们的理论。凯恩斯曾经说过：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经济学家思想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经济学家的奴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现实中的困境，面对政策效果不如他们的预期，往往归因于既得利益集团，归因于改革受阻，其实他们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主张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一样，影响我们的社会，危害我们的经济。

粗粗总结起来，当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普遍得到认可和流行，并正在影响我国社会和危害我国经济的错误理论和认识，突出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现象看成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优势。一直主张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控制投资，放慢增长。

二是混淆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没有注意投资与消费在两种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错误地主张用消费取代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本没有看到在长期的潜在增长中消费是增长的负变量，只有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是联系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真正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变量。

三是没有深入研究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以揭示中国高储蓄的真正来源。没有发现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与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历史性结合才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高储蓄现象，只是简单地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对比得出中国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的结论，并普遍地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源自中国勤俭节约的美德，是社会保障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因而主张刺激消费降低储蓄。没有看到



中国高储蓄的背后对应的是中国随着人口结构演进而来的人口老龄化时代的人口负债，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这种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跨期平衡问题。

四是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高低判断标准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恐高症、投资厌恶症，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这种完全脱离国情、脱离经济学投资与储蓄需要平衡的最基本原理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没有看到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这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客观必要和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宏观经济和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实现平衡的内在要求。

五是没有看到基于高投资而来的高增长对一个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伴随高增长而来的结构问题、污染问题、能耗问题、环境问题既反映了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更反映了我们的体制某些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解决的正确之道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节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的行政体制，使环保法规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应否定高投资、否定高增长的必要与好处。

六是由于对我国高储蓄与高投资形成的原因及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因而无法解释中国高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真正来源和本质。理论界充斥着诸如贸易顺差源于国内产能过剩、进口太少出口太多，源于出口定价太低，工资太少，土地环保成本没有覆盖等似是而非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很多涨工资、提成本、挤企业、压出口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致使沿海地区出口优势大伤，企业大举外迁。在外汇储备上也形成了诸如外汇储备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为减轻外汇储备急升压力，提出所谓藏汇于民等不正确的认识。没有看到如果不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入手去解决高储蓄下必须进行高投资这个根本问题，高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问题是难以真正解决的。

七是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储蓄剩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不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和投资建设需求难以满足、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归因于金融。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怪象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因为你对投资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投资存有偏见，在你的影响下投资在抑制，经济在下走，进口上不来，顺差自然而然，储备自然增加，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央银行在被迫应对流动性过剩冲击与保增长保稳定之间艰难前行，默默承担着巨大的宏观经济失衡压力。

八是把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实体经济只剩下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主流经济学家又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过剩了，这么一来，他们所提倡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只能是把巨额

的国内金融资源投入农业、服务业及他们所说的新兴产业、高新科技。而事实上，房地产业是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这四大基本需求中“住”的问题的重要产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入的又是与“行”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领域，不把“住”与“行”看作实体经济，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本来，所谓实体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中与证券股票等金融产业相关的虚拟经济而言，是应该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为防止金融等虚拟性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业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繁荣而言，而非不能支持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产业。

九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过剩，唯一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主体，真正能解决市场过剩问题的机制应该是市场机制。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在提倡市场化改革，主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说我国许多产业过剩了，有的产业又不足了，主张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之手推进结构调整，加快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我们姑且不论这类判断是否正确（其实大多数时候这种做法和判断都不准确，甚至错误，譬如对中国的汽车、钢铁、水泥等产业，从二十多年前就在喊过剩，这期间这些行业产能已经增加了几十倍，今后仍有增长空间，他们却一直在喊过剩），就是从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讲，所谓结构优化和产能过剩问题应是一个交给市场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唯一任务是揭示市场结构调节的基本原理，找出市场调节失灵的根源及提出有关完善市场机制的政策主张，而不应主张由政府来进行结构调整和以行政手段解决产能是否过剩的问题。

十是忽视中国经济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和发展中存在的紧迫性和差异性，忙于在总量超越的喜悦中去总结经验、推广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放慢点了，数量和速度没有过去重要了。如果我们回到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差别、总量与人均的差异，城镇化、农民工、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中来，其实我们发展的紧迫性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减少。按人均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质量等来比较，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还很大。我们的经济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中陷阱”危险，还面临我们独有的“极度老龄化陷阱”威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仍像过去一样重要。

过去，我也是这种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接受者和倡导者。近几年来，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我发现这种理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远离了中国的现实，是一种没有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而完全从虚假现象中得出的错误认识，有些理论甚至是一些未经消化吸收而简单照搬照抄来的西方经济学变种理论。不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视为标准答案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反思和纠正，我们的政策就难以回归常态，符合实际。譬如，简单地把我国的



消费、储蓄与投资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消费太低、储蓄太高、投资太多，而没有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独有的国情现象（如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人口结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消费特征、储蓄行为和高投资的客观必要，没有真正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分析中国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所以，看不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再譬如，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由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而来的人口红利所对应的恰恰是中国将会面临的老龄化负担即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存在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在中国现在高储蓄的背后将会面临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中陷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应对中国独有的更突出的老龄化陷阱威胁的问题，把中国的这种高储蓄用于刺激消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我从2005年以来一直进行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中国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抉择》等著作。现在这本《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是前两本著作的姐妹篇，是我这些年来围绕上述问题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有关理论认识的最新成果，是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一个最新总结。其中，最突出的是想强调如何利用中国优势跨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和“老龄化”这两大陷阱，让中国经济真正步入现代化，真正实现中国梦。

古人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应该说从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到五十岁的天命之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本书就是我在这个黄金时期对有关经济金融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一个记录，基本反映了我的经济金融理论观点及其形成过程和这些思想在实践工作中的试验和体会。由于这些思想和实践行动主要集中在如何分析和看待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有关金融改革及其实践，集中论述了有关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一中国独特优势的由来以及如何珍惜利用好这种优势突破发展中陷阱和中国特有的老龄化陷阱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

全书从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实践应用、对话演讲、其他杂文等五个方面把从2005—2015年这十年中的有关理论思考成果和实践工作体会进行了总结和分类。第一篇“经济理论篇”收录了我在这十年之中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核心是我对中国消费、储蓄、投资、增长等重要问题提出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高储蓄的由来、高投资的必要和高增长的原因，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源于中国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历史巧合，是中国难得的珍贵的发展资源和有利条件，应该备加珍

惜和利用；高储蓄为中国的高投资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人口红利与负债平衡的内在要求。中国的高投资既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是平衡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好办法。中国的高投资是优势不是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高储蓄支持下的高投资，既是中国优势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奇迹的全部解释。离开投资，谈不上增长，只有投资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这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外经济增长实践的实证总结。第二篇“金融理论篇”反映了我对有关金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其中核心的是金融生态理论和金融改革主张，我提出了金融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金融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金融体系的功能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把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改革的核心应是按照这个规律完善金融准入机制、金融退出机制、金融竞争机制，使金融体系成为一个物种多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高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共生共存的有机体系。金融监管就是要遵循和维护这个体系的竞争规则、生态特征，使之既充满竞争效率又运行有序。我在推动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等实践中都是尽力贯彻和探索完善这种金融生态的理论认识和有关政策主张。第三篇“实践应用篇”收录了我分管金融稳定、货币信贷、调查统计、征信、反洗钱、科技、发行保卫等工作的有关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反映了我的一些实践创新和突破。其中，金融稳定工作强调了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重要性，主张及时清理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推动了湛江商业银行、汕头商业银行的重组；货币信贷工作推动了广东省农村信用社改革，提出并实践了“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改革思路；强调了货币与信贷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了如何有效处理好货币管住与信贷搞活的关系问题；调查统计工作强调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分析预测的客观性，加强了数据库建设和分析预测工作；征信工作提出了如何以信贷征信为本，做好征信体系互联互通拓展应用的有关建设思路；科技工作提出了科技建设“一个核心、二个面向、三个统一”的工作思路，即充分认识科技是业务工作的核心，必须面向业务面向基层，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对反洗钱工作提出了绩效评估、分类监管的反洗钱工作思路。对发行保卫工作进行了按经济区域布置，把“押运、库存、处理”三中心合一的实践探索。这些探索有的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明显的社会经济效果，在全国进行了推广；有的仍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辖内推广应用，收到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第四篇“对话演讲篇”收录的是我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金融时报》、《财经》、《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当代金融家》等有关报刊杂志记者的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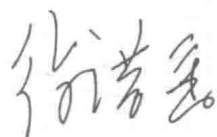


访对话和我先后在不同场合的演讲稿，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第五篇“其他杂文篇”收录了我的一些难以归为前面四篇的工作信件、考察报告、回忆文章等，是我专题理论与实践探索之外的一点工作生活侧面。

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对话、演讲和杂文，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和工作业绩，而是与我先后工作过的人民银行梧州中支、东莞中支、广州分行和总行调查统计司的同事们共同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包括理论文章、分管工作实践及总结，都是在这些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完成的。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我有如此大的能力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我要感谢他们！由于人数众多，有的直接在帮我，有的间接在帮我，恕我不一一署名，其中也包括所有我的领导。但我要特别感谢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宋彩女士和曾在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交流的梁晗女士，是她们帮我完成了文稿资料收集、整理、打字、核对等大量事前事后工作。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银行潘功胜副行长、调查统计司盛松成司长及全体同事、东北亚国际金融投资集团胡斌总裁、北京红都米兰服饰有限公司于福军总经理、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功伟董事长、金陵华软投资集团王广宇董事长、合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剑云总裁、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王庆总裁、上海基玉投资有限公司王翔总裁、中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柴森董事长、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王少杰会长、营口银行刘庆山董事长、广州银行姚建军董事长、南粤银行韩春剑董事长、长沙银行朱玉国董事长、华兴银行夏博辉行长、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戴兵总经理、天弘基金宁辰副总经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姚余栋所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中国经济出版社乔卫兵副社长、《财经》杂志袁满女士和由曦先生、和讯网苏东先生等，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女士，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李扬先生，西南财经大学著名教授曾康霖先生，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行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洪崎先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新供给经济学创始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先生，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先生，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先生，独立经济学家、亚联资本、银票网董事长范棣先生，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先生对本书的评论和推荐。

由于本书涉及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又因我的资料整理归类工作不细，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有关核对修改工作，书中缺点错误可能不少。为了保持有些文稿的原貌，以便反映我的思想观点的演变完善过程，有些文稿可能存在较多重复，对此敬请读者理解、原谅。本书出版的目的一是为了整理一下自己十

多年来的心血劳动；二是为了抛砖引玉把自己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抛出来供大家批评讨论，引起大家重视，推动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入，尤其是推动对当前我国主流经济学错误理论和观点的批判和反思，加快建立和完善真正植根中国、植根现实的中国经济学！我很希望本书的出版在达到这两个目的的同时，对大家的工作和思考有帮助！文稿中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欢迎来信交流。我的邮箱是：xunuojin@sina.com。本书的出版所得将全部用于在我的小学母校、中学母校湖南省平江县鹿石小学和瑚珮中学设立奖学基金，欢迎热心支持教育事业和贫困山区孩子们成长的同仁们加入这一助学行动！



2015年3月3日于北京

目 录

(上册)

第一篇 经济理论	1
主流经济学的迷误与反思	3
论中国优势	13
警惕轻视增长的危险	29
降税降息降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36
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稳定投资的重要性	49
坚定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66
投资是平衡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的最好办法	71
再论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83
中国经济杠杆率研究	94
中国经济仍有适度加杠杆的空间	113
怎样看待我国的低消费	123
怎样看待我国的高储蓄	133
怎样看待我国的高投资	142
怎样看待我国国际收支的高顺差	149
怎样运用木桶原理	159
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	162
高储蓄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方法	193
回归恒等式是实现我国宏观经济均衡的根本途径	200
重视松紧搭配 力促总量平衡结构转换	207
物价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实证	213
货币超发是经济失衡的根源还是结果	215
对我国“池子理论”的一点认识	228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通胀形势	234